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2.003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的 内在机理及实践反思

种鹁, 邱耕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根本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刚需。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知行范畴、知行主体、知行关系以及认识过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由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促使他思考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弊端,近代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讨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指引,自身学习和革命实践经历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系统诠释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启示,即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注重以时代诉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以及重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关键词:毛泽东;传统知行观;实践论;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A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2-0016-0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②。从本质上讲,创造性转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现代性诠释。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传统直观的整体思维和哲学伦理化特征的影响,传统知行学说存在明显不足。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知行学说批判吸收和科学改造,实现了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激活了传统知行观的生命力。系统诠释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汲取其思想精髓,对新时代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具有重要价值。

一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认识论关于知行范畴及其关系的讨论绵延不绝。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开创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学说的批判性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 知行范畴的转化

在“知”“行”范畴方面,传统知行观对它们的认识基本局限在道德领域。传统知行观中“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对封建政治道德的认识。传统知行观中“行”主要是指道德践履,即封建政治道德的践行情况。比如,《尚书·说命中》提

收稿日期:2023-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016)

作者简介:种鹁(1994—),女,山东枣庄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3年版,第194页。

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里面的“知”即封建统治秩序和道德原则,“行”即践行封建统治秩序和道德原则。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普遍存在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统治和调节本阶级成员之间的关系,拟定了一整套等级礼仪和孝、悌、忠、信等道德原则。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他们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生活实践又时常破坏这些礼仪和原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正是对这种原则和生活实践脱节现象的哀叹,也是当时守旧的人们为了维护旧的上层建筑所做的一种努力。再比如,朱熹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①“知”是对自己心中固有的理的认识,“行”是行其所知,即以所知之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个先验的“理”是指封建统治秩序和道德原则的绝对化,因此,他所谓的“知”主要是指对封建政治道德的认识,“行”主要是指对封建政治道德原则的践履。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范畴进行了新的诠释。在“知”层面,他明确赋予了“知”一般认识论的涵义,指出人的认识不仅囊括对社会、人和人各种关系的认识,而且囊括对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②可以发现,毛泽东将传统哲学以“道德原则体认”为主要目标的“知”转变为以“求真”为主要目标的“认识”,赋予了“知”一般认识论的涵义,突破了传统哲学中“知”(认识)这一范畴的狭隘性,使“知”从“道德体认”的狭隘伦理框架中摆脱,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在“行”层面,毛泽东赋予了“行”实践的涵义,将具有“道德践履”特征的“行”转变为“重视社会生产和活动的具有社会性的实践”。毛泽东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③他赋予了“行”一般认识论的涵义,完成了对传统哲学“行”(实践)范畴的改造,在深层文化机制上实现了“行”与“实践”范畴

的有效衔接。

(二)知行主体的变化

在中国传统实践观中,关于实践主体为谁的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回答。唯心主义者往往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诠释为实践主体,广大群众被排除在实践主体之外。旧唯物主义知行观主要围绕圣人君子们待人接物的处世行为、原则以及封建纲常伦理准则和行为展开。比如,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充、王夫之等人皆是将人的活动视为脱离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个体抽象活动或者是符合封建伦理标准的“圣人”“君子”活动以及“伟人杰士”所开展的一系列探索或者试验活动。

可以发现,中国古人讨论的实践主体脱离了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们忽视人们所开展的实践活动不是单个、抽象性的活动,而是集体、具体性的活动,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总是居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其制约与影响。毛泽东意识到传统实践观关于实践主体的局限性后,摒弃唯有圣人才能进行实践活动的观点,提出了广大劳动人民皆能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就是“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④的主张。毛泽东将实践主体界定为当时社会环境中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如此,他还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转化为党的群众路线,将作为主体的人民的实践视为认识的来源。他的观点赋予了实践主体更为丰富的内涵。

(三)知行关系的转化

中国传统哲学界长期关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以《尚书·说命中》提及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为起点,知行关系成为早期哲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其中最典型的是“知先行后”“知行合一”“行先知后”三种知行关系论。

“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不是来源于客观世界,而是先天就存在或头脑本身所固有的。例如,老子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

^①陈清:《中国哲学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成。”^①“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知与行本身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即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目的,知与行无法分离,二者存在彼此依存的关系,共同完成整个认识过程。无论是“知先行后”还是“知行合一”都是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的知行观,割裂了主观与现实的关系。“行先知后”的观点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承认人的认识是从物到感觉。例如,墨子提出:“请感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②他认为只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反之则是无,其观点明确诠释了客观世界对认识的制约。“行先知后”的观点虽然认为客观世界是人类认识的源泉,但他们主张的由“行”致“知”观点是一种消极反映论。尽管他们也立足唯物主义立场,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对认识的先在性,但他们不知晓“行”或“实践”是革命性、批判性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毛泽东将《实践论》的副标题定为知与行的关系,可见传统哲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颇为深刻。但是,他对传统实践观不是采用简单、直观的方式进行承袭,而是对“知”和“行”的范畴进行创造性诠释,将认识和实践联系起来。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以认识来源问题为突破点对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进行批驳,同时对认识论曾经存在的直观性缺点进行指正。具体来说,一方面,毛泽东以“行”(实践)为基础,使“知行关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提出物质的生产活动是人们获取正确认识的源泉,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认知,即“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③。另一方面,毛泽东以辩证法为理论前提,也就是突出“知”(认识)来源于“行”(实践),“行”(实践)对“知”(认识)具有决定作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④同时,他还重视“知”对“行”的方法论意义,明晰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对此,毛泽东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⑤毛泽东系统阐明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做到了对知行关系的动态研究和把握。

(四)认识过程的转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论述主要蕴含在“格物致知”理念中。“格物致知”即通过对周围事物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获得知识和智慧。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格物致知”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认识发展的全过程。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就对“格物致知”进行阐述,并对认识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关于此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来自二程(程颢和程颐)及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人。二程认为:“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⑥这里提及的认识方式体现了从感性层面过渡到理性层面的认识构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寻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的相同之理即“一理”,具有局限性。朱熹对二程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了扬弃。他认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到一定程度,“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⑦。朱熹的这一思想触碰到了认识论发展的规律问题,但他的“格物致知”思想仍停留在伦理道德修养层面。在陆九渊眼中,世间万物都是源于“心”,“格物”事实上是为了达到“格心”的目的。只要体认“本心”,万物之理便“不解自明”^⑧。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主观意识作用于客观事物,并非对客观事物进行求知。王夫之认为“格物”和“致知”相辅相成完成整个认识过程,强调行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⑨虽然王夫之对“格物致知”具有更为科学的理解和

①《道德经》,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43页。

②方勇:《墨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⑥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⑦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⑧张立文,默明哲:《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400—401页。

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上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页。

掌握,但是仍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

毛泽东采用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的思维方式,对传统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进行了转化。他认为,认识过程存在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首先接触外部事物,通过感官感受到事物的外部联系。伴随实践的发展,人们去思索事物的内在联系,继而在头脑里形成关于此物的抽象概念。循此继进,运用逻辑的方法对抽象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推出符合逻辑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从实践中获得关于外部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这只是第一步。“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所以,从感性现实中得来的认识终究要回到客观世界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这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③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诠释打破了传统知行学说诉诸直观和直觉、具有非逻辑思维的局限性,摒除了传统哲学思维充斥的神秘莫测的色彩,使传统知行学说未解决的难题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二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理

深受传统知行观影响的毛泽东成功实现了对其创造性转化,其转化蕴藏着内在的机理。具体来说,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促使他思考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弊端,近代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讨为他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他实现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

转化提供了指引,自身学习和革命实践经历为他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

(一) 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促使毛泽东思考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弊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五四”革命风暴后诞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正如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④历史经验证明,革命阶段发生的每次重大转变,总是要把认识论问题突出来,这是因为革命的指导者总是需要首先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转变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更是如此。面对推翻旧世界和改造新世界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需要掌握最先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格外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特别是辩证唯物论中认识论的学习,力图用这一观察国家和人类命运的认识工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要使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并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需要对各种现存的哲学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创造性转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为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无产阶级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⑤。在此原因下,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作出分析,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得到提升和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二)近代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讨为毛泽东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发

近代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使得知行关系再次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受特殊阶级和时代条件的局限,近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知行观不够彻底和完备。比如,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意识到基层群众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未完全抛弃封建社会思想,其知行观中存在轻视和贬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但是,早期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索,确实对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知”“行”范畴的涵义层面,早期知识分子为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将“知”“行”范畴的界说由德性之知和道德践履转向了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比如,在“知”层面,魏源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纳入“知”的范畴。孙中山指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如果是科学以外所谓的知识,则“多非真知识也”^①。在“行”层面,魏源将樵夫、估客的活动作为“行”的某些形式。孙中山将“科学家之试验”、造船、建筑等“生产事业”以及饮食等日常活动看作“行”。这种转变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行”范畴的认识,使他更加重视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这一点在《实践论》中有着明显体现。

在知行主体层面,与传统知行观中将以达到圣贤为目的、追求安身立命的个体作为主体不同,近代中国由于时代条件的转变,知行的主体也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广大人民群众。比如,康有为认为,任何知识都应该得到大众的公认,因此他说到,“圣不秉权,权归于众”,“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何如,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②。孙中山指出:“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③群力是指要注重集合群体的智慧,靠大家共同奋斗,不能依靠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去做。这种转变影响着毛泽东关于知行主体的认识,促使他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实践,将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实践的

主体。

在知行关系层面,结合近代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早期知识分子克服以往知行观的狭隘界限,将传统知行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魏源将目光投向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充分肯定“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过程,同时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在思想上对革命党人产生了负面影响^④。他提出“行易知难”的知行观,试图改变中国民众不思进取的局面,使革命者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以及革命实践的可行性^⑤。早期知识分子的这种观念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行关系的看法,使他更加注重实践的支配地位,强调知行合一、实践检验真理的观念。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毛泽东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指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的思想文化陆续传入中国,但这些思想并未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目的,直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了现实的证明,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思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阅读了诸多马列主义的文献,马列主义认识论为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指引。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直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广泛搜集并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等^⑥。在阅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理念。这些理论观点使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才是真正科学的认识方式,只有通过实践来验证和改进认识才能不断推动认识发

①《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6页。

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③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0页。

④《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9页。

⑤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3页。

⑥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3页。

展。例如,《共产党宣言》强调人类历史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观点。毛泽东在阅读和研究《共产党宣言》时,深刻领会了这些理论观点,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构建了关于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重要性的理论体系。

(四) 自身学习和革命实践经历为毛泽东实现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

认识的产生不仅要具备客观条件,主观条件也起着关键作用。毛泽东不仅具备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底,而且革命实践经历相当丰富。这些主观条件为毛泽东知行观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方面,毛泽东熟知传统知行学说。在家乡韶山的南岸私塾,毛泽东熟读了《论语》《孟子》等著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在杨昌济、袁仲谦等老师的指导下,他广泛涉猎中国古籍。据毛泽东的同学张国基回忆,“对于我国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他都广泛地加以选择研究。课余喜读的书籍有《楚辞》《诗经》,先秦诸子的学说;史学方面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此外,对《昭明文选》,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各家骈散文,也加以广泛涉阅”^①。即使投身中国革命,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也从未放松。以《毛泽东选集》为例,毛泽东在文章中引用的中国古籍范围很广,计有《论语》《孟子》《老子》《左传》《孙子》《列子》《吕氏春秋〈新序〉》《淮南子》《史记》《汉书》等,其中引《孟子》《论语》处最多。这些著作中蕴含着古人对知行问题的看法。中国古人对知行观的讨论对毛泽东知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②。比如,中国古人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尊重实践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使毛泽东更加注重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毛泽东革命实践经历丰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从报纸上知晓孙中山领导同盟会的起义事迹后,弃笔从戎,参加革命军,在湖南新军中当了一名列兵。1919年“五四”

运动爆发,毛泽东积极参与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湖南也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1921年到1927年间,在积极学习理论的同时,毛泽东曾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湖南五县展开了为期23天的实践调查,根据当地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调查,要求井冈山工农红军深入实地展开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丰富材料,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出调查报告。这些做法为解决当时革命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客观依据。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等地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调查,并以此材料为依据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等。通过参与革命斗争和实践,毛泽东领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在革命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不断检验理论,使自己的知行观得以不断深化和完善。

三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的实践反思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实践,为新时代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示范性借鉴。

(一)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毛泽东成功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离不开他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③新的征程,做好中华优秀传统

^①《青年毛泽东之路(9)一师苦读时》,《湖南日报》2013年9月5日。

^②王蕾:《关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③杜尚泽,邢雪:《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①、“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②的重要论述,在系统整理、全面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下功夫。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内容广,“今古义蕴之奥窔,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③,对其挖掘和阐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如此,已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也需要拓展。具体来说,要系统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④。同时,还要在分门别类整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做到有所专、有所精。

(二) 注重以时代诉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种创造,是现实的人面对现实需要的一种创造。离开了现实人的现实活动,既难以实现文化的积累,也难以实现文化的传承。亦是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是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以及面向未来的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旦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就会失去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⑤。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离不开现实需要。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根据时代条件 and 实践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比如,面对当前社会诚信不断消减、道德滑坡日益突出等问题,可以

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⑥,赋予其新的涵义。

(三)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分析传统文化,可以把握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科学指导。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愈发受到肯定,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传统复归、“以儒代马”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实际上,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但这种继承不是推行“复古主义”,而是在鉴别分析、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和发展。即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它们与今日的现代化建设也存在诸多不协调、不适应的地方。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能够使它与时代发展潮流相适应,真正发挥它的当代价值。具体来说,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要重视实践的作用,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

(四) 重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经验和成果能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离不开对其他知行学说的吸收和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⑦随着全球化发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②《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④《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⑦杜尚泽,邢雪:《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与融合已成必然。这就更加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具体来说,首先,创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文明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其次,积极参与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与其他文明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互相学习借鉴,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因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新思路。最后,引入外来元素与本土文化融合,借鉴外来文化中的创新元素与本土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新颖作品和形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of Mao Zedong'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CHONG Juan & QIU Gengti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fundamental to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Mao Zedong creatively transformed the categories, subjects, relationship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reasons why he achieved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were mainly due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which prompted him to reflect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view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y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which provided inspiration for him,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which provided guidance for him, and his own learning and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m.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is of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at is to strengthen the excavation and elucid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pay attention to activating it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practical theory;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校对 唐尧)